

吳淑鳳等編，《不可忽視的戰場——抗戰時期的軍統局》
台北：國史館，2012。318頁。

林桶法*

情報一直以來都披上神秘的面紗。由於其機密性，許多檔案或文件經常被銷毀；遺留的檔案，原始或管理機關基於各種理由，大多不願意公開，或僅選擇性地公開。爲此，研究情報機構或情報史者僅能從一些當事者的回憶或口述資料進行爬梳。以民國以來的情治機關爲例，過去在資料方面最多的是情報機構所編的資料彙編，如中華民國國防部情報局編印的《中美合作所誌》(1970)、《忠義救國軍誌》(1962)、《國防部情報局史要彙編》(1962)；另有一些情報要員的口述或回憶錄，如喬家才，《浩然集：鐵血精忠傳》(台北：中外圖書出版社，1977)、良雄，《戴笠傳》(台北：中外圖書出版社，1980)、蔣京訪問、紀錄，《滕傑先生訪問紀錄》(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3)、干國勳，《三民主義力行社與民族復興運動》(台北：干苓苓，1986)、沈醉、康澤等，《軍統內幕》(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9)、康澤，〈康澤自述——我的再清算〉〔收入潘嘉釗等編，《康澤與蔣介石父子》(北京：群眾出版社，1994)，頁1-218〕等。華人研究者大多著重個人或機關活動史爲中心，如張霈芝，《戴笠與抗戰》(台北：國史館，1999)、古僧編著，《戴笠將軍與抗日戰爭》(台北：華新書局，1975)、喬家才，《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抗日情報戰》(台北：中外圖書，1979)、干國勳，〈力行社與軍統局〉〔《中外雜誌》，卷31期1(1982年1月)，頁69-72〕、鄧元忠，《三民主義力行

* 輔仁大學歷史系教授

社史》（台北：實踐出版社，1984）、洪小夏，〈抗日戰爭時期中美合作所析論〉（《抗日戰爭研究》，2007年第3期，頁59-87）、馬振犢，《國民黨特務活動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江紹貞，《戴笠和軍統》（北京：團結出版社，2009）、劉會軍，《蔣介石與戴笠：獨裁統治的忠實鷹犬》（北京：團結出版社，2009）等。英語世界的研究有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的《間諜王：戴笠與中國特工》[*Spymaster: Dai Li and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儘管如此，這些史料與研究成果，仍無法滿足眾人對民國情報的好奇。

2010年中華民國各界籌備慶祝建國百年活動之際，國防部軍事情報局希望在回顧建國歷程中，能為情報工作的發展及其重要領導人戴笠找尋歷史定位。該局前局長張戡平邀請國史館商議合作研究集出版事宜，雙方決定以「薪傳專案」為名，將目標鎖定抗戰時期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軍統局），透過歷史研究，還原情治工作在民國史上的面貌。第一步驟先將軍事情報局的相關檔案解密，交由國史館進行數位複製，陸續整理完成後命名為《戴笠史料》、《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檔案》等；並於2012年4月起陸續開放閱覽（並出版專冊）。這批史料從移交、整理到開放、出版，有其特殊的價值。這是情治單位較完整的將史料移交給史政單位，對於民眾及學者而言邁出一大步。2011年10月8日舉行新書發表會上，國史館館長呂芳上致詞時指出：《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彙編》系列叢書中，多數文件都是首次公開的珍貴檔案，藉由書籍的出版，讓過去這段充滿神秘色彩的情報工作得以公諸大眾，使全民更能正確認識抗戰期間，情治人員犧牲奉獻的高風亮節，為這些出生入死卻鮮為人知的情報英雄，取得在歷史上發聲的機會。在《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彙編》出版的〈導言〉也強調：「是以軍情局此次主動公佈檔案，不但讓情報工作的歷史有了自我表達的機會，也提供了學界鑽研情報作戰的契機，而這項補闕對於民國史的研究有特殊意義」。（頁V）

第二步驟邀請學者專家研討抗戰時期的軍統局。2011年10月8日在國史

館舉辦「戴笠先生與抗戰時期情報作戰學術研討會」，針對十個課題討論，闡述在有形的抗日戰場外，不可忽視的另一個戰場——情報作戰。情治單位史料的解密與開放確是相當大的突破，學者從不同的面向進行討論，對學界或一般民眾了解此段時期軍統局的發展有很大的幫助。本書即為此次研討會的論文成果集結。然由於解密的資料仍然有限，學者討論的課題也受到限制，仍無法窺知抗戰時期軍統局的全面發展與定位。本文先稍加介紹該書的內容，再針對全書的問題提供拙見，希望完成導讀與校注的作用。

一、全書重點

本書題為《不可忽視的戰場——抗戰時期的軍統局》，其實是一部論文集，國史館力求對軍統局成立經過及抗戰時期的發展作全面的了解，邀請蕭李居、王良卿、楊維真、陳世榮、李君山、陳進金、吳淑鳳、張瑞德、張世瑛、羅久蓉等國內具代表性的學者針對十個專題進行探討。

民國初期，情報的蒐集並無專責的組織，1927年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成立密查組，1932年4月1日，「三民主義力行社」（力行社）成立特務處；9月改組為「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下轄二處，第二處負責情報。1938年8月，該局重組，第一處另成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中統局），軍統局仍由戴笠負責。1946年8月，軍事委員會改組成國防部；10月，軍統局改為國防部保密局。1955年，保密局改組為國防部情報局，1985年7月，情報局與國防部特種情報室併編成立國防部軍事情報局。隨著機關與人事的變遷，情報工作性質也略有不同，除情報的蒐集外，任務包括抗戰、反共及國際合作等，可討論的課題甚多。本書以抗戰時期的軍統局為題，利用新的史料，補足過去研究的不足。全書由國史館館長呂芳上作序言，除〈導言〉外，共分十章，沒有結論，也沒有附徵引書目。各章要點分述如下：

蕭李居，〈戴笠與特務處情報工作組織的開展〉一文，主要研究軍統局的前身——「力行社」特務處的成立及工作的開展。由於蔣介石認為「無組織、

無幹部、無情報」是其第二次下野的主因，他回南京述職後即成立特務處，以解決「無組織」的困境。本文介紹特務處的組織架構及經費、戴笠對情報工作的規劃與要求等課題，有助於了解情報系統的成立及其運作。作者強調戴笠具有特工人員的特質，且有政治頭腦（頁 33）；從他對特務處情報人員的訓練計畫及要求的內容而言，確實能窺知其能深受蔣信任，並得以主導情報機關近二十年的重要原因。

王良卿，〈情報領袖與派系政治——從國史館新進史料觀察戴和 CC 系勢力的競爭〉一文，討論國民黨內「力行社」解散及其與三民主義青年團、抗戰時期軍統局與 CC 系的關係，並介紹情報工作的任務，包括：別働工作、郵電檢查、運輸統制、貨運管理等。其中也討論到戴笠的政治手腕。全文不是全面的討論，而是針對國史館《戴笠史料》進行介紹。王良卿非常肯定該史料的價值，文中談到：「《戴笠史料》確實是非常罕見的，至少足資做為相關史實探討基礎，以及與坊間憶述文獻進行史料對話的珍貴一手檔案」。（頁 36）

楊維真，〈1938 年長沙大火事件的調查與檢討〉一文，討論長沙大火事件的背景（焦土政策）、事件的爆發、事件的善後等課題。長沙大火由於死傷人數甚多，建築、財物等損失相當慘重，引發各界的撻伐，蔣介石要求進行調查、檢討與處分相關執行者。該文旁徵博引檔案和當事人的報告，說明軍統局並非該事件的執行者，並辨析戴笠並無直接責任。

陳世榮，〈戴笠的經濟作戰構想〉一文，討論到抗戰時期的經濟作戰：物資的搶購與搶運、經費與情報的來源等。文中提出戴笠的經濟作戰構想，多數是在實戰中，憑藉個人的經驗與反應，逐漸成形，再加以制度化，因此許多具體的成效要到抗戰後期才呈現出來。

李君山，〈抗戰時期西南運輸的發展與困境——以滇緬公路為中心的探討（1938-1942）〉一文，透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西南進出口物資運輸總經理處」（西南運輸處，1937 年 10 月成立）和「運輸統制局」（運統局，1940 年 4 月成立）等機構的設立及其運作，說明國民政府如何突破日軍的封鎖運入

軍需，以及維持西南運輸線——滇緬公路的困難，並兼論軍統局如何在艱險環境中參與西南運輸物資的搶運工作。分別討論西南運輸的戰時發展、抗戰前期西南運輸處、運統局及滇緬公路運輸等。作者特別著眼於抗戰時期的滇緬公路，分析包括路況、設備不佳、滇緬政府處處推諉等滇緬路政問題；同時亦指出中方自身管理不善，對車輛數目、行駛噸位無法確實監督，負責人員能力不足等因素。這些分析有助於更加了解抗戰時期對外交通的困難。

陳進金，〈戴笠與忠義救國軍〉一文，從組織、訓練、作戰等三方面勾勒忠義救國軍的面貌。該軍先後承繼自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働隊、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働隊教導總團，均由戴笠主導成立，目的是因應抗日情勢的需要，以及配合情報工作的進行，後與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中美合作所）合作，經過美方教官訓練、接受美式裝備後，一如作者強調：「抗戰期間的忠義救國軍，是一支由戴笠所創辦的戰鬥武力；歷經幾次的整編改制，從一支諜報隊伍到全美式裝備的部隊，其對中國的抗日戰爭與反共戰爭，做出了一定的貢獻」。（頁 172）

吳淑鳳，〈軍統局對美國戰略局的認識與合作開展〉一文，主要探討美國戰略局參與中美合作所的情形，論述軍統局利用美國戰略局與海軍部的競爭，讓中國方面趁機扭轉原由美國海軍部控制資源的劣勢，維護國家主權。軍統局人員因戰略局的訓練，習得心理作戰技巧，也具備蒐集資訊和行動的能力，但戰略局人員在華各行其是，至指揮系統紊亂，且私與外界接洽，令國府深感困擾，雙方合作有得有失。全文以軍統局對美國戰略局的了解作為探討的重點。

張瑞德，〈雅德賚(Herbert O. Yardley)與中國——兼論抗戰時期的密碼戰〉一文，論述軍統局為了破譯日本密碼，經由蕭勃接洽，聘任美國電訊情報員雅德賚來華訓練中國電訊情報和偵譯技術人員。文中指出，雅氏在華期間曾經破解日本航空密碼，讓西南地區民眾能在日本空襲之前得到預警，減少傷亡。本文雖談及電訊情報工作中有關密碼工作的問題，但大都以介紹雅德賚為主。

張世瑛，〈記憶與檔案下的戰後保密局北平站工作〉一文，以檔案及回憶錄為主，探討戰後保密局北平站的工作。情報任務一向機動、神秘、隱晦，難

留下實際運作過程，但從北平站六位站長的回憶，可知戰後初期北平站曾破獲中共在華北不少的情報據點。全文就北平站的組織演變、戰後北平站的重大情報行動、戰後歷任站長的自述、王蒲臣案卷中該站的最後行動等方面進行探討，但也承認資料不對等性，許多自述都在強調派系及人事鬥爭，對於工作發展反而語焉不詳。

羅久蓉，〈從軍統局到保密局〉一文，文筆流暢，從化整為零、戴笠之死、三分天下、公私之間等方面討論戰後情報單位的演變。1946年9月，軍統局發布「奉令撤銷」的消息，但早在前一年年底，已開始私下運作人員「化整為零」納入正規體制，警察部門成為戴笠必爭的標的。1946年3月戴笠意外身亡，軍統局撤銷後的組織架構，業務有交由交通警察總局、內政部警察總署和國防部第二廳「三分天下」的說法，從戴笠接班人鄭介民的「改組十原則」，是採取公開與秘密原則交互運作，即由上述三機構負責公開任務，由保密局作為秘密核心機構。全文有許多精闢的分析，如提到戴笠之死的影響時，指出：「戴笠之死對戰後情報特工改組造成的衝擊幾乎是全面的，大至國家發展，包括國民黨是否因此在反共鬥爭中失敗因而丟掉大陸，小至個人前途、漢奸生死，皆受影響」。（頁269-270）

二、評述與總結

本書由十位學者分別就其專長，並配合新史料進行研究。全書屬於論文集，雖然以抗戰時期的軍統局為研究焦點，但各章之間並無太多的連結。研究抗戰時期的情報史，可能許多課題並沒有被討論到，如軍統局對外的布建工作、策反工作等；有些則討論不詳，如軍統局幹部的訓練（課程中有毒藥的製作與應用）、各站的執行績效、美國對中國情報的意見與態度等。也呈現部份重覆的地方，不斷的有篇章提到「力行社」特務處成立的經過，如蕭李居文（頁8-13）、王良卿文（頁38）、陳進金文（頁144）等。此外，就全書而言有一些問題：

首先，格式有待統一。全書由於是論文集，雖經過編輯，在格式上力求一致，但仍有一些問題，如注釋方面，大部份學者引用國史館檔案時，都用「典藏號」，但吳淑鳳論文的註則用「入藏登錄號」，如註 1、3、12、15、16、17 等。目前國史館查閱系統大都使用「典藏號」，這類格式在一本專書中應盡量統一。

其次，未附「徵引書目」。一本專書後面附「徵引書目」已經是出版的最基本要求，應補充力求完善。此外，全書有〈序言〉、〈導論〉，但沒有〈結論〉。或許由於十篇論文作者研究的面向不同，不能遽下結論，但出版單位應該綜合十篇論文的研究結果，作簡單的總結。

第三，許多地方分析不深入。如蕭李居文，頁 19，「表 2、特務處 1938 年 5-9 月經常費收支對照表」，顯示每個月赤字甚多，五個月下來，不足金額達 418,814.15 元，對於這些赤字如何籌足，並沒有進一步說明。蕭文結語部份，頁 33，「同時嚴格的信條卻未發揮應有的效用」。這是評估軍統局作用極重要的部份，為何軍統局要求信條嚴格，卻未能發揮作用，是訓練、過勞、制度、人事、經費、統治、設計問題還是其他原因？分析此原因將有助於評價軍統局在抗戰時期的表現。又由於限於篇幅，致使蕭文以二十頁來討論特務處問題時，難免簡化，反不如張霈芝的《戴笠與抗戰》專書，利用四章共一百頁，詳細討論特務處的成立與發展。

陳世榮文，頁 98，談到軍統局的經費時指出：「在國民政府財用不足、經費籌措困難的情況下，軍統局從事相關活動的經費，大多仰賴自籌，以及透過財政部、中國銀行、中央信託局、航空委員會，以及軍統局附屬商行的支應」。可惜後文未分析如何自籌？其提到軍統局附屬的商行有哪些？如能進一步說明，將有助於了解軍統局的運作。

陳進金文，第肆部份「作戰：抗日與反共」，作者強調「忠義救國軍是一支富有戰鬥力的勁旅」。（頁 164）然抗日僅舉 1943 年王嶺戰役，反共舉 1945 年的浙西戰役為例，並未談到忠義救國軍其他在抗日與反共上的表現，其實無

法據此肯定忠義救國軍是一支富有戰鬥力的勁旅。中國大陸已有碩士論文，如邢燁，〈戴笠與忠義救國軍〉（南京：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碩士論文，2008），其中對忠義救國軍的評價負面居多，應可深入討論其正負面部份。

由於各章各有所專，僅再舉其中幾項與作者討論：

蕭李居談特務組織成立、發展及戴笠的角色，特別以力行社為中心進行討論。特務組織中有一些單位，學界與一般民眾不盡理解，如「力行社」、「三民主義青年團」、「復興社」、「藍衣社」等，前兩者作者為文討論，但在談力行社時，復興社隻字未提。按康澤的回憶，革命軍人同志會、革命青年同志會是蔣介石決定下野回南京述職後，欲發展的兩個復興社的外圍組織；復興社成立後，蔣介石為保持秘密，因而又決定在復興社內再增加一個內層組織——力行社。（參見潘嘉釗等編，《康澤與蔣介石父子》，頁 34、35）因此在談力行社時，是否應針對復興社作簡單的介紹。此外，有關藍衣社、力行社等相關歷史，應可參考鄧元忠的專書：《國民黨核心組織真相：力行社、復興社，暨所謂「藍衣社」的演變與成長》（台北：聯經出版社，2000）。

王良卿的論文探討情報領袖與派系政治，作者長期研究國民黨的派系問題，專書及多篇專文發表，此次以國史館新進史料討論戴笠與 CC 系勢力的競爭。社會學理論之一即是衝突論，團體與個人、政府與人民、團體與團體、個人與個人間存在許多衝突，從民國的發展上來看都是不爭的事實，但若將有些不對等或性質不同的團體作對比，要放在哪一個基準點討論確實是很大的學問，王文有些地方即出現這樣的問題。如頁 59，「軍統與 CC、中統的競爭激烈」。軍統與中統可以對等，一個是軍事的情治單位，另一個是黨務系統的情治單位，兩個都是機構，有其制度的運作，CC 系則是一個派系，不是一個實體的制度單位，其與軍統、中統之競爭與合作都是派系內的運作，與制度及組織無關。國民黨不等同 CC 系，CC 系成員與戴笠人事上或權力上的爭執似不應擴大解釋；情治系統為各方所厭惡是一個事實，情治單位之間也有某種程度上的競爭與鬥爭，中統、軍統在職權上有許多重疊之處，彼此之間互為監聽，

是否能解讀為內部的鬥爭？作者分析蔣介石長期以來「分而治之」的統治模式，對情治系統亦復如此，也同情與肯定戴笠，然在肯定情治機關的同時，也要思考其作為是否也造成一些個人及團體的傷害。

楊維真以 1938 年長沙大火事件的調查與檢討為題，作者文筆流暢，對事件的背景、發生的經過、調查及責任作詳盡的分析，特別辨析戴笠的角色，認為張治中要負最大責任的同時，也認為：「戴笠對於焦土政策亦持保留態度，是以日後軍統人員執行撤退時的破壞行動，大體均以軍事目標為原則」。（頁 89）有關長沙大火的發生，其實是一連串錯誤所帶來的結果，最大的問題在於「焦土抗戰」的策略，不論策略是來自李宗仁或其他軍事將領的建議，顯然蔣介石不僅了解，且在某種程度上支持。戴笠身為軍統局的負責人，參與此軍事戰略頗深，《徐永昌日記》也提到：「或謂此事戴雨農亦參加，似已取得蔣先生同意者」。（參見中研院近史所於 1991 年出版的該日記第 4 冊，頁 421）關於長沙大火的資料已相當多。〔可參考何智霖，〈長沙大火相關史料試析〉，《國史館館刊》，復刊第 5 期（1988 年 12 月），頁 131-142〕戴笠情治系統的調查報告其實只是補充，此次事件從焦土政策的決策、執行機關、執行時機等，不論哪一環節出問題，參與者都是共犯結構的一員，每一個個人，包括被判死刑者或未受審判者，多少也應負某些責任，戴笠及其情治系統亦不例外。

吳淑鳳著眼於軍統局對美國戰略局的認識與合作，特別指出美國戰略局與海軍部的矛盾，這樣的觀點過去研究中美合作所的學者早已提及。〔如賴淑卿，〈抗戰時期「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成立的經過〉，收入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三屆討論會秘書處編，《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三屆討論會》（台北：國史館，1996），頁 934。〕美國戰略局對華的企圖，不僅戴笠及軍統局的人員了解，就連擔任鄧諾文(William J. Donovan)傳譯工作的黃天邁也清楚指出：鄧諾文「想利用軍統局的權勢，以合作為名，在中國境內——包括中共割據地區建立情報站，徵募訓練突擊隊，裝備中共，一切由戰略局指揮，不受軍統局節制」。〔黃天邁，〈戴笠與梅樂斯（上）〉，《中外雜誌》，卷 50 期 2（1991

年 8 月)，頁 17] 作者引述檔案只是更加印證過去的說詞而已。

此外，美方有關中美合作所及美國戰略局的檔案與資料不少，如 Roy Olin Stratton 已出版的專書《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稻田海軍》[*SACO: The Rice Paddy Navy* (New York: C. S. Palmer Publishing Co., 1950)]；另外，典藏於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梅樂斯(Milton E. Miles)檔案，也值得參考。如能對照國史館典藏的《戴笠史料》等檔案，應更能釐清中美合作所來華的運作。全文系統地分析軍統局從了解美國內部的問題到與美國展開合作，討論美國戰略局與海軍部間的矛盾，詳細介紹美國戰略局在中美合作所內開辦的四項業務：情報、研究分析、心理戰爭及秘密行動等工作的情形。其中仍有一些不夠詳盡者，如氣象及通訊情報方面，各地建立起氣象工作站、觀測哨等，這些氣象情報對美軍在太平洋上海軍作戰、跳島作戰、阻擾日軍對南洋的運補和轟炸日本本土等軍事行動中，起了重要作用。但仍有一派的說詞認為中美合作所對華沒有貢獻，作者可以為文深入討論。

總之，筆者首先肯定情治機關，能將檔案移轉給史政單位典藏並公開，其次肯定國史館能在最短的時間內整理並開放檔案。為了讓更多的學人與民眾瞭解軍統局的業務，國史館特別將這批典藏的檔案彙輯出版為《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彙編》，共六冊，涵蓋軍情戰報、軍統局隸屬機構、經濟作戰、忠義救國軍、中美合作所的成立與業務等面向，對於研究民國情治歷史者應有極大的助益。特別是這些檔案與學界共同合作，對本身的機關史發展來說，是很重要的一環；對學界來說，這十篇研究應只是一個開端，其後應可吸引更多學人投入這塊領域的研究。

本書十位學者在專業領域上已有相當的成果，加上能利用此批新的史料，或討論新的課題，或提出新的歷史詮釋，或補白過往研究成果的缺漏，儘管因檔案資料解密有限，仍有許多待補闕的部份，但確有引導情報作戰研究的作用，也為抗戰史的研究開啓一個新的里程碑。